

东亚近代知形论

李光来 著



EAST
ASIA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东亚近代知形论

李光来 著



EAST
ASIA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近代知行论/李光来著. --沈阳: 辽宁大学
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10-5947-0

I. ①东… II. ①李… III. ①知行学说—研究—东亚
—近代 IV. ①B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076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7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董晋赛 贾海英

封面设计: 徐澄玥

责任校对: 杨明海

书 号: ISBN 978-7-5610-5947-0

定 价: 18.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内 容 摘 要

本书主要探讨和把握在近代史上近代知识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中心的韩国、日本的他者认识如何形成的问题。

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就如同铜钱的两面，而事实上自我认识始于他人的发现与认知，因为认知欲求首先是指向他人的。世上万物皆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为万物都是以“内—存在”或是“间—存在”的方式存在的。近代可以看作是西方人的近代。近代是17世纪之后西方越过对东方“他者”的认识阶段而在他者中实现自我化的西方历史意识的时间结点，因此，近代化的知识也不过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意识而已。东亚三国在近代则只是中国的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江户与明治时代。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东亚文化与知识为何要勾勒近代的知形图呢？第一，这是以西方为基础的“内—文化”（intra-culture）不可避免地“间—文化”（inter-culture）转化。在西方势力东进的疾风怒涛中，东亚的知识体系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所谓的近代这一强有力的内部环境调节系统（interofective system）改变了东亚三国的知形图，这是由于内部环境调节系统是依靠内部环境相互作用和外部环境互相影响而形成的。第二，在西欧两大霸权主义，即基督教和近代科学技术结合而形成的近代性（modernity）感染下，东亚三国也不得不构筑新的折衷主义知形图，东亚在近代三百年里发生大范围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原因也在于此。第三，近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大熔炉。直到最近其解体和脱离近代化运动开始之前，世界各国的文化和知识大部分都是近代这一大熔炉里进行的再铸造。

序 言

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就如同铜钱的两面，而事实上自我认识始于他人的发现与认知，因为认知欲求首先是指向他人的。即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也是以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作为自我认识的前提，甚至于自身他者化的意识也是以对他人的认识的必要和要求为前提的。他者并不是与自己无关的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由存在论或认识论的（遗传角度或是统摄角度）复杂体系中相互联系的。

世上万物皆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为万物都是以“内—存在”或是“间—存在”的方式存在的。主张人类社会与世界在具有“内—存在”（l'être—au—monde）关联的同时也有“间—存在”（l'être—entre—monde）关联的理由也正在于此。由此可以说，对以“间—存在方式的人类”的自我认识正是认识世界的契机，这也是人类对他者认识的范围决定对世界认识范围的原因。同时，这也意味着将自我认识的范围世界化。

西方对“作为他者的东方世界”的认识也正是如此。从11世纪开始直到现在，西方一直将东方作为“他者”来认知，虽然这是对自我认知的契机，但也有试图通过他者中的自身化来实现他者与自我的一致化，或者实现自我他者化的原因。1088年意大利在西方最先成立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其原因就是基于对西亚——伊斯兰世界知识和文化的发现及感受到的惊讶。

自此时开始，西欧各国不仅仅是在西亚的知识和文化中试图

实现自我认识，而且为了深化他者的自身化而将此范围扩大到对东亚文化和智慧的认知上。例如，对“中国”这一国名，西方人就有两种叫法，即 Cathey 和 China，其原因是认识中国的途径有两种。前者是经由伊斯兰世界和中亚北部而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将“契丹”这一单词俄语发音的英语化而形成，而后者则是早期进入印度的葡萄牙人对“秦”的称呼。

在 1600 年利玛窦 (Matteo Ricci) 来到北京之前，最先来到中国的西欧人是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 (Innocentius) 派遣的传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 (Giovanni de Plano de Carpini)。在与伊斯兰进行了五次十字军战争后，正在准备第六次战争的教皇为了夺回被伊斯兰夺去的匈牙利而派其到蒙古，意图与之建立同盟。1246 年 7 月，卡尔平尼在历经 1 年 3 个月后，经乌拉尔山和天山北麓到达喀喇昆仑 (Karakorum)。但是将中国的地理、语言、文化、科学、思想、宗教等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社会的人则是哲学家、科学家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1214—1292)。他在自己的著作《大著作》(Opus Majus) 中，不仅对中国，还对蒙古及朝鲜等国家进行了广泛的介绍。

对中国介绍最详细的，当数写出了《东方见闻录》的马可·波罗 (Marco Polo)，经天山南麓到达中国的。他在此居住了 17 年，在其 1290 年回国前，中国内陆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如果说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是描述 13 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与憧憬的书籍，那么约翰·曼德维尔 (Sir John Mandeville) 的《东方旅行记》则是 14 世纪的“中国报告书”。16 世纪对中国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引起西方对东亚向往热潮的西班牙人马丁·拉达 (Martin de Rada) 和蒙德沙 (Juan G. de Mendoza)。特别是蒙德沙的《中国大王国志》(1585) 一书，在 70 年间被翻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并先后印行了 30 版。因此，此书被认为是最标准的“中国报告书”，并起到了引发西方社会对东亚向往热潮的作用。近代哲学的先驱——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 (F. Bacon, 1561—1626) 对中国的认知也来自这一本书。

近代可以看作是西方人的近代。近代是 17 世纪之后西方越过对东方“他者”的认识阶段而在他者中实现自我化的西方历史意识的时间结点。因此，近代化的知识也不过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意识而已。东亚三国在近代则只是明清的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江户与明治时代。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东亚文化与知识为何要勾勒近代的知形图呢？

第一，这是以西方为基础的“内—文化”（intra—culture）不可避免地向“间—文化”（inter—culture）转化。在西方势力东进的疾风怒涛中，东亚的知识体系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所谓的近代这一强有力的内部环境调节系统（interofective system）改变了东亚三国的知形图，这是由于内部环境调节系统是依靠内部环境相互作用和外部环境互相影响而形成的。

第二，在西欧两大霸权主义，即基督教和近代科学技术结合而形成的近代性（modernity）感染下，东亚三国也不得不构筑新的折衷主义知形图，东亚在近代三百年里发生大范围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近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大熔炉。直到最近其解体和脱离近代化运动开始之前，世界各国的文化和知识大部分都是在近代这一大熔炉里进行的再铸造。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收集的是笔者自 2000 年以来，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发表的有关“东亚的近代与脱近代的知”方面的 9 篇论文和新补充的 3 篇论文。对在此期间翻译这些论文的辽宁大学张东明博士，在此期间给予多方支持和关照的程伟校长、穆怀中副校长、陆杰荣副校长，教务处处长杨志安、研究生院院长唐晓华、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邵晓光、李平教授等我的许多老朋友们，以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臧树良书记、为出版本书而不辞辛苦的辽宁大学出版社董晋骞社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10 年 3 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篇 近代知的遗传论	1
第一章 以遗传学观点重读儒学	
——习熟、习染、习合的儒学比较	1
第二章 《海国图志》与东亚近代知形图	14
第三章 韩国近代儒教的知与西方思想	
——西学中的实学与实学中的西学	28
第四章 西教传入对朝鲜后期思想的影响	
——作为思想重层决定的一例	55
第二篇 交叉的知在东亚	80
第五章 东亚时代的结束与朝鲜的对应	80
第六章 韩国接受西方哲学的历史	89
第七章 西周的哲学 (philosophia) 与西方哲学	101
第八章 通理与反理：日本思想的二重论理	120
第三篇 脱中心时代的哲学	133
第九章 东西方文化的哲学对话	
——脱中心时代的哲学	133

第十章 作为再生对策的“伦理型共生主义”	
——试论生命伦理学·····	146
第十一章 21 世纪东亚式价值	
——从比较思想的角度·····	160
第十二章 为了实现哲学的协奏·····	185
附录: For the Fullfillment of Orchestrated Harmony	
in Philosophy ·····	198
参考文献·····	214
后记·····	216

第一篇 近代知的遗传论

第一章 以遗传学观点重读儒学

——习熟、习染、习合的儒学比较

一、引言

儒学是东亚文化与“知”的入场券。作为对东亚认识的下部构造，即认识素（epistēmē），没有什么比儒学更为重要。东亚三国的欲望移动史里不仅没有比儒学更有用的欲望移动的中间宿主，也没有比儒学更有效的“知/权力”。

东亚儒学思想的特点是：从知的胎生学观点看儒学遗传学，从知的政治学观点看是儒学系谱学。因为韩、中、日三国共有过的新儒学的形成条件，既是（外在的）系谱学，又是（内在的）遗传学。由于东亚三国的儒学是各自内、外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统摄性^①复合体，所以其各自的“知/权力”复杂系列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原因也是相同的。

^① 与其说统摄是移动欲望的作用或欲望移动的现象，还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综合欲望。因此，统摄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词汇。这一说法常常会随时隐含意识形态之中。另外，统摄使得欲望灵性化，东亚能够使得儒学灵性化的原因也在于此。参考：李光来著《方法哲学》，知与爱，2008年版，第137—144页。

由于统摄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作为复合体的儒学也会停止其内在的遗传，所以儒学遗传的中止、统摄（Consilience）性欲望移动的中断、文化和知的变化与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知/权力”的系谱学发生变化，复杂系当然也将发生变化。在 20 世纪，由于东亚儒学纽带的夭折而导致东亚儒学遗传学时代终结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习熟内在遗传样式

在东亚儒学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是遗传学，系谱学的权力关系也起了作用。自我复制的基因特点是进化过程中没有新的基因。社会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R. Dawkins）阐述：“自私的基因是不会被基因的交叉而破坏，只是交换着伙伴继续行进”。事实上每个个体都通过性伴侣遗传后代，因此，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体。这也是遗传学重视近亲度（relatedness）的原因。“思维方法的进化论”或者“思想的遗传学”也存在这种现象。

这也是东西方思想史没有全新内容的原因。任何自生（自主）的思维模式，个体群也必然从内部开始经历进化。思维方法的进化和思想的遗传就像生物学的个体在与配偶（gametes）不断组合，遗传过程中虽然发生变化但不会被消灭。思维方法的进化和遗传也只是随配偶的更替（通过习熟、习染和习合方法）发生变化。这也是把（广义上）韩、中、日的儒学史看作儒学遗传史，甚至看作是多种观点和立场的道统遗传史的原因。

1. 孔孟道统与隔世遗传

中国哲学史比任何哲学史的隔世遗传（atavism）范例多是因为，不仅把“温故知新”看作是善意的思维方式的潜意识流贯中国历史，而且私有欲望的移动线路也倾向于过去。儒学更是如此。这也是孔子的周王朝乡愁治愈不了的原因。并且这也是新儒学作为先进儒学而内含的遗传表现型（phenotype）的原因。

像孔子对《六经》的习熟，中国的思想进化即“温故知新”的起点是“习熟”。特别是中国儒学的遗传，即使将道统遗传看

作是《四书》的开端（或线索），《论语》看作是儒学遗传学的因子型（genotype），那也是习熟《六经》的结果。

程朱学所说的《四书》道统在隔世遗传周期中是微观周期（microcycle）。从孔子到现代儒学的儒学遗传史：孔子（BC. 552—479）→曾子（BC. 505—435）→子思（BC. 483—402）→孟子（BC. 372—289）。可以看出初期的隔世遗传基因潜伏期不长。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不到两个世纪。并且以传达遗传学观点，从孔子到子思仅仅是将“孔门”基因遗传下一代而已。

传达遗传期以后经过短暂的潜伏期到了孟子时，隔世遗传特征变得清晰是因为不仅习熟了“仁”，还与“义”习合的熟合。像生物遗传学中每个生命体都有DNA一样，儒学遗传学也以孟子的政治论及由孔子的“仁”作为基因的“人间论”的核心理念“仁义”形质转换而成的。况且每个生命体作为遗传物质具备三个条件（可调节蛋白质的合成，可自我复制，DNA在真核细胞存在于核的染色体）遗传，而孟子的隔世遗传也呈现可解读的进化倾向。

例如：①尽管“仁”蕴含怜悯和亲爱，“义”蕴含正义与道义，但不如用“道德”代替等。

②孔子的“仁”不仅被孟子自我复制，并且通过唐代儒学复古主义者韩愈（768—824）的自我复制（称颂道并“传授圣人的‘道’继承最正统的也是孟子”）实现隔世遗传等。

③“仁义”基本上是在孔子思考（区分“利”与“义”）架构内为谋求伦理发展而进化遗传的。

但是新儒学的隔世遗传不同于孔孟时期的遗传。因为从先秦儒学到新儒学的隔世遗传周期（与“新配偶”交配经历了一千四百年的潜伏期）形成了宏观周期，所以虽然在传达基本的遗传代码（genetic code）上没有差异，但是潜伏于历史和文化曲折中的儒学遗传周期也是不同的。

并且新儒学的隔世遗传也不同于孔孟时期的复制实验（rep-

lication), 是因为儒学的复制实验不仅基因的潜伏期不同, 而且潜伏的持续条件和潜伏因由也不同。这也是与微观周期的保守 (conservative) 复制不同, 宏观周期呈现出分散 (dispersive) 复制 (一部分被保留, 一部分被合成) 的原因。如果说孔孟的先秦儒学是保守的复制, 那么, 宋明的新儒学可以说是分散的复制。

在中国哲学史上很难再找到像宋明理学那样的宏观周期的隔世遗传。基因的可长期持续性潜伏是经过千年以上隔世期间并且还能遗传的原因。当然在北宋之前不是没有过儒学或儒教的隔世遗传征兆, 像主张大一统儒学思想 (学说) 的董仲舒 (BC. 176—104) 和把儒学作为佛学攻斥的自然选择, 主张适者生存的韩愈 (768—824) 等。由于将儒学看作是中国历代政治意识形态根基的董仲舒 (BC. 176—104) 的建议被采纳, 儒学像国教一样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事实上, 为实现强有力的统一政治,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并在元光元年 (BC. 134) 起只给修学儒学行德的人任官职的机会, 像设置专门传授易、书、诗、礼、春秋的五经博士官职 (BC. 136), 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

况且董仲舒 (BC. 176—104) 不仅在孟子的“仁”、“义”、“礼”、“智”四主德之上追加“信”, 扩大为五常, 还将仁=木, 义=金, 礼=水, 智=火, 信=土, 五常套在五行上。他把“仁”、“义”、“礼”、“智”归为道, 并认为道是行道的工具, 他的主张不同于先秦儒家 (要从人原有的感情中拯救道德的根基), 他认为“道的大原在于天” (“道”是源出于天的, “天不变, 道亦不变”), 显示出分散复制的初期征兆。

尽管如此, 孟子主义进化遗传 [“知/权力”的儒学范式 (paradigm)] 还是没能继续勾勒出儒学遗传学的基因图。由于遗传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使儒学的遗传基因潜伏, 只能中断, 或断断续续地维系。就像由酵素的基因缺陷引起的疾病一样, 儒学的遗传复制包含非正常的样式。这也是孔孟道统之后的遗传, 由于配偶的交替而改变自然选择命运的原因。

总之, 先秦儒学的遗传征兆现象 (优胜到劣胜的形质转换)

不管是在宏观周期还是微观周期，与优胜形质多以代代相传相反，劣胜遗传形质多以隔世遗传出现。事实上，就长期潜伏隔世遗传的宏观周期而言，新儒学的出现背景也是一样的。

2. 新儒学与优胜遗传

但是新儒学的出现和长期持续意味着由劣胜到优胜的转换。因为，周敦颐之后宋明代的儒学作为气数理心学派，只是分散复制变为正规化，并且还是没有隔世的不断进化遗传的，所以儒学遗传史中，程朱陆王的宋明理学时期（遗传样式观点）代表（比孔孟道统前期还要强的）基因优胜形质（dominant trait）时代的到来。如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南宋朱熹、陆九渊等宋明理学的复杂进化和种的分化形成的遗传“家系图”。

但是，对（以张载和邵雍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基因图的修学和（理学主流）“程朱陆王学”家系图的分析就能看出基因个体群样式不简单。因为他们的道统遗传比任何家系还活跃。并且，由于从《四书》等《经典》中找到，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组成家系的基因形质，使得孟子之后中断的道统隔世遗传得以维系。

陈来也主张：“理学与唐代之前的儒学大不相同的原因是，以理学的价值体系和学习体系为主要依据的《四书》等‘经典’得到了尊崇和信赖，并且话题也总是围绕着这些‘经’的事实”。到了宋明理学变得活跃的以《四书》为代表的“同系交配”，说明由劣胜变成优胜的（中国哲学史上）儒学文艺复兴的到来。只看孟子之后的唐中期，提倡并宣扬（断折千年之久的）道统的韩愈（768—824）和弟子李翱就知道儒学复兴的实现遗传率（realized heritability）最高。这也是“程朱陆王”体细胞分裂最旺盛的原因。

从文→武→周公→孔孟的儒道断折后的儒学遗传史可以看出，由二程洛学（濂洛关闽中正统理学派）开始道统的征兆（优

胜形质的转换,)才变得清晰。程颢(1032—1085)的主张:“周公死后圣人的道未能实行,孟子死后圣人的学问未能续传;因道未能实行,所以近千年未出现杰出的政治家,因圣人的学问未能续传,所以近千年未能出现真正的儒学者。出生于一千四百年后的先生(程颢)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取的学问,并要以此‘道’觉悟百姓”。

那么什么是“二程”梦寐以求的“道”?并且为什么会成为道统复兴的优胜形质?程颢的“理”是“天理”,是“道”,即“理”。就是“天道”,“物理”,“圣理”,也是“义理”。总之,这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是永恒不变的先验(先天)道德原则也是作为人类本性的“性”。程颢是如何以“理”,即“天理”和“圣理”再现道统的?

但程颢的“理”不是只在他们的洛学中隔世遗传的。至少可以肯定那是从北宋到南宋的集团遗传因子型。但程颢之后从谢良佐、杨时、罗从彦、李侗、侯师圣、胡宏,到朱熹(1130—1200),即从“洛学”到“闽学”,是集团遗传学同系交配的同形接合度(homozygosity)使理学能够长期维系。

从遗传“家系图”可以看出,那既是宋明理学的“知识素”(epistēmē)也是“知”的下部结构。即使“鹅湖之会”在理学的旅程中以“性即理”和“心即理”区分朱熹和陆九渊(1139—1193),但主张“我的心既是宇宙又是‘理’”的陆学,也积极地实现与道统(特别是孟子)的分别交配(assortative mating——也叫同类交配)。相反,陆九渊强调,是自己的心学实现了道统的隔世遗传,而不是程颢的心学。

他说道:“由于是到了‘二洛’诸公时期才得到已断传近千年的学问,所以未能明确阐明。若到了今天还不能阐明,那我还能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孟子之后,到了我这时(自己的学问)才得以阐明”。因此,是自己搭接了道统的遗传。

反驳朱熹主张的“义外说”,并提出“心之本体”的王守仁(1472—1529)也(仅过几百年)图谋复兴(比陆九渊之后的理

学还)沉滞的心学。其发源也在于孟子和陆九渊的“本心”。因为“致知”的“知”是孟子的“良知”，所以从“致知”到“致良知”的进化遗传(继承和发展)更是如此。

由此可见，时隔一千四百年实现的宋明理学的隔世遗传，以多种表现形式(phenotypes)显示基因图和遗传家系图，在东西方人文遗传学、思想的遗传学，或思维方法的进化论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的“历史内”移动欲望(道统欲望)，不仅时隔一千四百年才实现隔世遗传，而且将复兴的遗传进化持续了近五百年。

3. 内在遗传样式的习熟

由于欲望的志向性和移动方式及欲望移动的内外差异，思维遗传方式显示内(intra)移动和间(inter)移动样式。这种样式在道统遗传也是相同的。如果说内部移动是内部遗传(intra-heredity)，那么间(inter)移动就是间遗传(inter-heredity)。因为在15、16世纪遗传到韩国和日本的新儒学遗传路径图(genetic path diagram)和基因图(genetic map)上也能清楚地看到内部遗传和间(inter)遗传的痕迹。这也是新儒学没有局限在中国“历史内”的隔世遗传，并在韩国和日本很活跃地进行历史间、思想间的遗传进化原因。

只要遗传移住(移住：由于添加或删除对立基因而发生对立基因的频度变化现象。在这一点上，移住与突然变异类似。)到韩、日历史和思想，新儒学既是东亚“历史间”的遗传现象，也是“思想间”遗传现象。韩、日遗传移住将遗传路径图延展到东亚三国。因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内”隔世遗传的新儒学，在韩、日思想史也按情由以“历史间”移住出现。并且移住遗传，不仅以“习染遗传”样式实现韩、中移住，还以“习染遗传”样式出现在中、日“思想间”。

就是“知/权力”的移动欲望向东亚积极地传播新儒学的进化与“种分化”。就像缺乏诱惑欲望的移动一样，欲望总是想着向缺乏方面转移，这是因为欲望具有从一个欲望不断移动到另一

个欲望的属性。况且，只要“知/权力”是不可分割的，那么缺乏的存在，就是欲望移动的作用因和动力。所以，可以说新儒学“知/权力”的东亚移动是欲望的自然选择。

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新儒学与东亚（韩、日）的遗传，即廓外的移住遗传不同。由于新儒学的遗传是断折的道统复兴，所以新儒学只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内”遗传，即隔世遗传。并且由于是在中国“历史内”熟合形成的遗传形式，所以也可以说是习熟遗传。如果廓外的移住是习染和习合的形式，那么廓内的隔世遗传就是习熟形式。众所周知，新儒学（尽管是宏观周期）不仅在中国哲学“历史内”中断式地隔世遗传，而且很早以前就以道统的习熟遗传进化。不仅胡瑗、范仲淹、欧阳修等北宋前期道者崇尚“六经”，连程颢（1032—1085）也强调“习熟‘六经’是复兴道统的最佳方法”。

三、间——遗传样式的习染和习合

正如之前所述，习熟是中国儒学在“廓内”同类交配遗传进化的方式和样式。新儒学是在道统的历史内习熟并隔世遗传进化的。但遗传方式和样式与移住遗传廓外的新儒学不同。因为韩、日主要是习染和习合的样式，就是移住遗传的间一遗传样式。

1. 韩国儒学与习染遗传

日本的古学派“荻生徂徕”认为习熟是像“六经”在自己的心理一样，“学习并熟练掌握”的方法，崔汉绮则曾主张“学习并熟练掌握直至被染”就是习染。习染就是“由反复学习而被染的知觉”。

那么韩国儒学为什么会边习染新儒学边遗传的呢？在韩国文化和韩国人的情绪里追求原创的溯源主义（originalism）倾向尤为突出。韩国人不仅不会在学习并熟练掌握阶段停滞不前，而且（像原著一样）被同化的欲望和（保存复制的）习染欲望比任何民族都强烈。所以作为移住（migration）遗传的韩国儒学（即朝鲜性理学）尽管是在廓外形成的间一遗传，但与宋明理学的隔